



10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EWENHAO
SHUXI

勃朗特
两姐妹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

第3卷

· 谢 莉 ·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宋兆霖 主编

徐望藩 邱顺林 译

河北
教育出版社

《勃朗特两姐妹书信集》译序

孔小炯

打开勃朗特两姐妹的书信集（除为数甚少的几封之外，今天存世的几乎都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读者会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古风扑面而来。或许是因为中世纪尚未远逝，或许是因为莎翁在约克郡荒原那古老的牧师住宅中别有魅力吧。当读着夏洛蒂那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披肝沥胆的信件时，你禁不住会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一段著名的人生箴言：“……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可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夏洛蒂生平交友不少，但真正倾心相交且称得上是终生挚友的却只有两位：埃伦·纳西与玛丽·泰勒。自从少年时在罗海德的伍勒女士学校结识了这两位女友，随着了解的增进，夏洛蒂对她们在情感上的眷恋也日益加深，终至成了始终不渝的朋友。在这以后，夏洛蒂虽然间或也会与她们怄气，但她深知这两位朋友的真正价值，也清楚她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所以，她始终把她们当做自己唯一可

依赖的真正朋友，常常通过信件，毫不掩饰地向她们倾诉心中的喜怒哀乐，坦率地向她们求助和请教，同时也毫无顾忌地参与她们的私务家事。她曾深情地说：“事实上，我只有两个坚贞真挚的朋友：你和她。就像我对《圣经》具有强烈的信仰一样，我也深信你俩的忠实和真诚。”夏洛蒂的这片真心没有落空，埃伦和玛丽以自己的行为证明她们确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并且从两个方面完善了夏洛蒂的人生：除了坎坷的生活和险恶的命运以外，人间毕竟还是有着令人慰藉、让人留恋的真情；尽情的倾诉又无意中缓解了夏洛蒂心理上的紧张与焦虑，使之能勇敢地承受住命运的无情打击。从这一点来说，夏洛蒂又是幸运的；她正确地选择了并执著于真正的友情，从而减缓了生活的重负——在这世上毕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就信函的本义而言，夏洛蒂·勃朗特的信件称得上是真正的书信。她非常会写信，已收集出版的她的一家的书信集中，她的信就占八百余封，而且还只是所存下来的部分信件。一日数封，对她来说是为常事。她写信，并未动笔之初就立意留待将来出版，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所谓书信体创作——这种写作其实是书信可悲却又被捧得极高的一种异化——她的信，尤其是写给埃伦和玛丽的大量信件，完全是心灵的一种倾诉，是情感的一种流泻，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写得无拘无束，甚至无章无法。确实，在真正的朋友面前，又何必非要用重重社会性的盔甲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在写信时我没法做到一本正经，如果我写信，我一定是想什么就写什么。”遗憾的是，世人很少这样看，包括她的丈夫也是如此，“男人们似乎不懂得把书信作为一种信息交换的工具来使用，似乎老是认为我们不谨慎……”。值得庆幸的是夏洛蒂并没有拘泥于世俗之见，与众多面世的名人书信相比，她确实以其真挚与坦诚把信函的功能发

挥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极致。

在这样大量的通信中，夏洛蒂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书信的实际功能，而且还无意识地得到了书信能给人的另一极大好处：心理宣泄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平衡。虽然身处穷乡僻壤，长于贫寒人家，夏洛蒂·勃朗特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在精神的追求上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她思想深刻，情感丰富，始终“希望能感受到精神自由”，但是命运多舛，重重的生活打击使她常常是欲哭无泪，心里愤懑至极。然而在家里她却无人可与言说：她的父亲，一个约克郡的穷牧师，性格有些乖僻自私，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而不屑与子女沟通；弟弟虽有才华，但又自甘堕落而暴殄天赋；艾米莉与安妮则是一个性格孤僻寡言，逆反心理很重，另一个虽然性情温和，但思想较为浅显，不足成为完美的交流对象。等到后来弟妹逐一夭折，更是连可能性都不复存在。倘若不是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夏洛蒂释放了由思维的活跃和境遇的悲惨导致的心理紧张与焦虑，并与创作的成功一起作用，获得了一种自我实现感，或许今天我们会在杰克·伦敦、海明威、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作家构成的名单里也找得到她的名字。

不过，夏洛蒂虽然与众多友人频频通信来往，但心灵的袒露程度却又各不相同。在她的信中，我们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拘无束、无遮无掩的，表现了夏洛蒂的心灵在生活中很少对人敞开的真实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写给埃伦和玛丽的信件中；另一种则是较为郑重其事，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卑微者，一个思想者，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总之，由其社会环境赋予她的特定地位和身分，并且力图体现出其特征。在与她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编辑威·史·威廉斯先生、詹姆斯·泰勒先生、她的老师伍勒小姐、她的文友盖斯凯尔夫人、哈丽特·

马丁诺小姐以及在当时著名的作家、批评家萨克雷、乔·亨·刘易斯等——在与这些友人的通信中，夏洛蒂就矜持和着意地显示了自己的这种社会性外壳。她是彬彬有礼的，也是深刻、独到和聪慧的，但有所保留，很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这一点甚至在书信的行文谋篇与措辞语气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两类信件虽然各具特点，但却互为补充，较为全面地满足了夏洛蒂思想与情感的交流需要。因为埃伦·纳西虽然真诚忠实，可是思想见识却平庸凡俗。夏洛蒂可以信赖她，然而却无法在思想的碰撞中溅出令人激动的精神火花，她只能对埃伦倾诉自己的感受，寄托自己的部分情感。在这方面，玛丽·泰勒就比埃伦强多了。玛丽性格豁达，识地不凡，思想不拘泥于世俗。可惜的是她后来去了新西兰，音讯稀少，而且也没有保存与夏洛蒂的通信。但即使仅从存世的几封信来看，显然夏洛蒂与她是有着更广泛的思想交流的。不过比较全面地满足了夏洛蒂在思想上的交流需要的，还是与史密斯、威廉斯、刘易斯、盖斯凯尔夫人等人的通信。她活跃的思维和深刻的见解在他们中找到了知音，也找到了对手。她从中所获得的思想上的自我实现感或许是夏洛蒂生命中一根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本书信集从迄今已收集到的有关勃朗特一家一千零四十七封信函、日记中，尽可能客观地选取并全文翻译了四百七十一封（篇），其中，极大多数为夏洛蒂的信。在这些信中，夏洛蒂比较完整清晰地表现了她的社会政治见解、人生观、宗教观和伦理道德观，阐述了她对于文学艺术的看法，同时也真切地显示了她的性格和心理上的一些特征。例如，她认为人生不该虚度，并且常常严肃地自我反省：“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究竟有何进步？瞻望未来的黎明，我又有什么宏图良愿？”她觉得人生中对精神的追求远胜于对物质的追求，所以她常为自己心灵的

变化而苦恼或振奋；但是个人的追求还是得受制于社会和家庭要求于人的义务与责任，“责任、需要，这些都是严厉的女主人，是不得不服从的”。因而在家庭发生变故或老父需要照顾时，她就会义不容辞地作出自我牺牲。

对于妇女问题和婚姻爱情问题，夏洛蒂也有比较深刻的思考。她批评了对男孩子给以充分的自由，对女孩子给以过分的保护的这种矛盾的教育方法；多次谈到没有财产的未婚女子状况，抨击了穷家姑娘坐等出嫁以谋生的做法；在就业、教育上，她为妇女的平等权利呼吁；在婚姻上，她更是积极主张莫基于爱情基础上的平等的婚姻。

总之，夏洛蒂·勃朗特在其书信中，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积极的思考，虽然不成系统，却也难能可贵，为我们了解和把握这位女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特点，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有关这一点，长期以来已有较多的研究和探讨可资参考，译者在此不欲赘述。此处尚想一提的是夏洛蒂书信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即在其信中，夏洛蒂·勃朗特经常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譬如说，她渴望与人真诚地沟通，然而当他人真的直抒己见时，她却又接受不了。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马丁诺小姐的例子。当《维莱特》出版时，夏洛蒂曾热情地要求好友哈丽特·马丁诺谈谈她的看法。然而当马丁诺小姐说了实话时，她却受不了，终至单方面与后者绝了交。她与刘易斯和萨克雷先热后冷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实际上，她的这种做法，源于一个她在评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时就已表达得非常明确的见解：“就我自己来说，我竭诚地希望找到真理；但倘若这就是真理，那她最好还是用神秘把自己包裹起来，用面纱把自己蒙盖起来。倘若这就是真理，那么凡是看到这真理的男人和女人，只能诅咒他或她呱呱坠地的那个日

子。”这也就是说，真理若是不合乎信仰或信念，那就要对它不起了。

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夏洛蒂·勃朗特自小就有着诚惶诚恐的宗教信仰。但是，当命运的打击接连地降临时，她也感到了迷惘，“生活已变得异常空虚，希望被证明不过是个奇怪的背叛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信她的话”，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发出了微弱而胆怯的抗议之声：那么多的不幸，真的“就像上帝认为堆之于我和我的家人头上是适当的一样”吗？……

夏洛蒂成名以后，在和贵族的交往中并不显得十分热切。她推辞沙特尔沃思爵士的邀请，拒绝成为贵妇人的座上客，并且嘲讽萨克雷为贵妇人进行或推迟演讲。但是，在她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贵族的交往还是使她感到愉悦的，而且她也承认自己对于贵族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种种蛛丝马迹似乎都在指向一个微妙的“罗切斯特情结”。

当史密斯先生出于商业考虑，要求夏洛蒂的《维莱特》为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露丝》让路，推迟出版时，她给盖斯凯尔夫人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可是在给埃伦的信中，她却把盖夫人说得可怜巴巴的。两信对同一事的表述完全不一样。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它们都表明夏洛蒂的思想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她一生中的不幸，考虑到她依靠自己的奋力拼搏，从无望中争夺到些许处于生与死、荒原与城市、上流社会与穷牧师阶层、可怜与骄傲、绝望与希望的夹缝中的成功和幸福，我们很容易明白她的矛盾心态只不过是她生活的一种映照罢了。

但是，即使存在着这些遗憾，也无损于夏洛蒂作为一个出色作家的地位。它们只是提醒我们：夏洛蒂·勃朗特既不是伟

人，也不是小人，而只是一个有着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的凡人。

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文笔流畅优美，又富于感情和智慧，成功地发挥了书信的实用功能和表现功能，可谓是信函的楷模，除了为我们从作家与创作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外，也是很有文学价值、颇堪一读的散文式创作。惜乎译者笔拙时迫，或有缺遗，唯待来日补憾了。

1996年1月于杭州

关于勃朗特两姐妹书信种种

杨静远

把书信作为单独的一卷列入勃朗特姐妹文集，我以为是恰当的，必要的。

作家的书信，无疑是文学的重要一枝，是文学的一支偏师。诚然，书信不同于作品，它不是经过殚思竭虑、苦心构思、惨淡营造的艺术创作，但它作为作家心灵的外溢，同样闪耀着思想的火花。那些酷爱和擅长写信，把它当作表述个人见解、抒发一己情怀的作家，他们的书信宛如一把启开心扉的钥匙，既可帮助探索和理解作家的内心世界，本身又是颇具可读性的散文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几个世纪以来，名家的书信佳作迭出，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书信文学传统。早期的著名书信多为豪门望族成员或政界闻人所作，例如15、16世纪的帕斯顿家族书简，反映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面貌。18世纪被认为是书信文学的黄金时代。才学之士、名门闺秀把写信当作一门艺术、一种教养、高品位的雅兴来玩赏，如玛丽·蒙太古夫人、哥

特小说家贺雷斯·华尔波尔都曾留下传世的书信名篇。正是在书信文学昌盛的年代，产生了像萨缪尔·理查德逊的《帕美拉》那样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书信体小说，不是偶然的。进入19世纪，由于交通邮政的长足发展，大大便利了书信往还，而社会又还没有跨进快速的现代生活节奏，人们有闲暇写长信，写信也仍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途径。与过去几世纪以叙述见闻轶事为主的书信不同，人们开始在书信中探讨问题，进行自省。诗人、小说家们发现，写信也是他们施展才华天赋的又一种方式，如拜伦、济慈、柯勒律治、兰姆，乃至更晚的劳伦斯，都是写信的大手笔。像夏洛蒂·勃朗特这样一位才情并茂的女作家，在二十年中竟写了八百多封思想文采兼备的信，是很自然的事。

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的书信都有文学价值。有的作家勤于创作，却疏于通信，例如狄更斯和奥斯丁所写的信，往往只有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勃氏三姐妹中，也只是夏洛蒂一人热衷于写信。这大概是由于她们在家中的地位不同，性格有异。夏洛蒂写信，常是出于生活的需要。穷牧师父亲无力关顾女儿们的前途，兄弟是个不负责任的浪荡子，作为长姐，她不得不为自己和妹妹的生计操心，致力于建立并保持社会关系。为了开拓文学事业，她不得不求教于知名作家、诗人，与出版人、评论家打交道，结交文友。不过她写信，恐怕更多还是出于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艾米莉情系荒原，苦恋家乡，满足于与世无涉的退隐生活。安妮生性腼腆内向，不善与人交往。夏洛蒂却在内心潜藏着一团火，她向往人间温情和心灵的沟通。她和终生挚友埃伦·纳西的通信，占她书信的大部。而她写给老师埃热的四封回肠荡气的信，流露出她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位异性的知己。她相信自己的才华，不甘心蛰居山乡，湮没无闻。书信是

夏洛蒂心灵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她的整个精神世界，追溯那燃烧着她的小说的激情的由来。夏洛蒂的小说几乎完全是自传性的，而书信则无异她的内心独白，是更开诚布公、直抒胸臆的自传。读她的信，我们可以明确无误、直截了当地了解她之为人和她之为作家，同时，也可以从中寻觅释读艾米莉那迷雾般的性格的蛛丝马迹。

勃朗特书信搜集和出版的过程，也是一首感人的爱心曲。若不是经过许多有心人长期的努力，这些珍贵文献早已灰飞烟灭，不会留传下来。第一位将夏洛蒂的部分书信披露于世的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1855年3月，夏洛蒂·勃朗特正值声名鼎盛之际，猝然病逝，在英国和海外引起莫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赞誉之声如潮从四面八方涌向荒原中的牧师住宅，给悲痛的老父和丈夫带来些许安慰。但有关女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外界颇多讹传，有损她身后的哀荣。父亲决定请人为女儿撰写一部权威性的传略，以正视听。他选中了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执笔人。这个选择再恰当也没有了，因为她是夏洛蒂的朋友，又是一位与夏洛蒂齐名的女作家。其结果，便是1857年《夏洛蒂·勃朗特传》^①的问世。它与博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传》鼎足而立，同为英国传记文学的不朽典籍。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夏·勃朗特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但这可贵的友谊尚在蓓蕾初放时就被死亡掐断，她们彼此了解还不很深。作传的任务，对盖夫人来说是相当艰巨的。但对亡友的深爱，以及作家的高度责任感，使她知难而进，全力以赴去搜集资料。她跟随夏洛蒂的脚印走遍她生活过的地方，寻

^① 中译本于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祝庆英、祝文光。

访有关的人，特别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征集她的书信。这本传记之所以引人入胜，激动人心，不在于它的女主人公的故事如何丰富多彩或离奇曲折，而在于作传者时常退居幕后，推出女主人公，让她亲自向读者说话，也就是传记中援引了大量传主的信。我们读着，会不知不觉跟在盖夫人身后，徐徐进入了夏洛蒂的世界，在山风呼啸的寂静长夜，坐在她家的壁炉旁，凝望她轻拨炉火，听她低声娓娓而谈。

有盖夫人的传记带路，勃氏一家人的传记相继问世。艾米莉的第一本传记是1883年由玛丽·罗宾森撰写的。同时，搜集勃氏文物的工作也不遗余力地进行。难得的是，这些工作一无例外是由民间自发来做的。1893年，以哈沃斯人士为主的民间组织勃朗特协会成立，为他们引以自豪的家乡才女们奉献一片爱心。1895年，哈沃斯勃朗特陈列馆开幕，1928年迁至勃氏一家的故居，成为永久性的博物馆。

书信的汇编出版则较传记晚了几十年。到1896年，才由热心的勃朗特研究者克莱门特·肖特历经艰辛出版了第一本书信集《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社会圈子》。由于涉及版权问题，该卷中没有包括盖夫人的传记中引用过的信，是一大缺陷。直到1908年，传记版权终止，肖特才得以将其中的信收进来，加上后来又发现的其他信件，重新编为一集《勃朗特一家：生平与书信》。肖特认为，他已经把勃氏书信收罗净尽了。但无论盖夫人或肖特的书中，都未包含揭示夏洛蒂深层感情生活的四封至关重要的信。盖夫人去比利时访问埃热先生时，肯定看到了这四封信，并为之震惊。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使她为亡友讳。直到1913年，《泰晤士报》爆出冷门，发表了夏洛蒂致康士坦丁·埃热的四封法文“情书”及其英译文，真情才大白于世，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有关夏洛蒂感情性质的争论。

1932年，研究者托马斯·怀斯和亚历山大·赛明顿合编的《勃朗特一家：生平、友谊和书信》四大卷问世，标志着勃氏书信汇编的新里程碑。这个集子在肖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约三百封，共一千零四十六封，从三姐妹少年（1820年代）直到她们逝世后五十年（1880年代），全部按时序排列编号，可谓集勃氏书信之大成，成为以后的研究者、传记作家离不开的工具书。尽管几十年中陆续有零星的发现，但这书的权威性已经确立。把1932年的初版与八十年代的重印版对比来看，并未发现任何改动。

四卷集中以夏洛蒂的信为主，约占八百封。艾米莉和安妮的信各有一两封。余皆出自她们的家人、师友和其他社会关系。

1984年笔者曾选译过一本《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三联书店出版），选译了二百八十封信（部分信件有删节）。当时选译的标准，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说明夏洛蒂之为作家；说明她之为人。以前者为重点，后者也着重于思想内容，附带涉及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其他人如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玛丽·泰勒等的重要书信也酌情选用。此次选译的标准和范围大有放宽，除上述几方面，还加上传记性、资料性的内容，例如夏洛蒂写给几家出版商洽谈出书的一些书信（可以追溯她们的作品由手稿到出书的全过程），旨在较全面地反映勃氏姐妹的生平。尤其是艾米莉和安妮的几篇“日记”以及艾米莉的两封信，前译本均未选用。但因这是她们除作品外唯一留下的墨迹，作为生平资料仍很重要，因此也都译了出来。全书增加的书信共一百九十多封。

笔者在编译《勃朗特姐妹研究》和《夏洛蒂·勃朗特书

信》时，尚未能亲眼目睹勃氏生活的环境，许多细节只能凭想象和臆测，难免有失误和不确。1984年，笔者始得机会访英，在她们我的家乡山村小镇小住十天，对勃氏姐妹生活和创作的背景和氛围有了从书本上得不到的感性认识。我那时拍摄的照片以及多年搜集的图片资料，这次也部分得以插入各卷。但图片毕竟是静止的，难以给人一个动态的印象。为了把我的感受与喜爱勃氏姐妹的朋友们共享，我曾写过一篇游记——《淡雅、坚韧的石榴花——勃朗特姐妹家乡访问记》，刊于《世界文学》（1985年第1期）。屈指已是十年，哈沃斯的风貌想必又经历了某些变化。但尊重历史、珍爱文物古迹的英国人，会悉心保存勃氏故居的旧貌。那么，我的那篇访问记想还不致严重失真过时。为了代替我难以尽说的千言万语，我把该文的片断摘引于下，再次和读者一道神游那个如诗如幻的石榴之乡。

例如伦敦像一部磅礴的历史巨卷，爱丁堡像一部宏伟的叙事长诗，那么，勃朗特姐妹的老家哈沃斯就像一首甜美而忧伤的抒情小诗，如同荒原上的石榴花，它朴素淡雅，然而令人难忘。

七月中的一天，我从伦敦上火车，直奔哈沃斯而来。我仿佛要到久别的朋友家做客，止不住心扑扑地跳。车行至西约克郡首府利兹市换车，半小时后到达山区小城凯利，又换乘一列专供旅游用的纪念性蒸汽机小火车。机车喘着气，吃力地爬进彭奈因山区，那驰名于世的荒原景色渐次展现眼前。十几分钟后，车停在哈沃斯车站。微雨中，一辆出租汽车载着我爬上“正街”的三十度陡坡。我睁大了眼睛，急切地打量着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不住地拿它和盖斯凯尔夫人在我脑中印下的图画做着比较。这就是那个“狭长、零落的村庄：一条陡峭的

窄街——那么陡峭，以致铺路的方石都得竖立着。好让马蹄子有所附着，不致倒滑下去……”这石砖路特意保留了下来，尽管周围都修了平坦的柏油汽车路。每块方石的角都被无数行人的脚踩圆了，像一块块长方形的面包。沿街那些灰黄石墙的老房子也大部保留下来，只是门窗漆得雪白亮堂，衬着大玻璃橱窗里各色的商品、食品，显得欢快明朗，不再是旧日荒凉山村的阴郁色调了。汽车在正街顶端的“勃朗特书店”门前停下，这就是我此后十天的下榻处——里奇蒙太太客店。前门是书店，门上两行字：“这里曾是哈沃斯邮局，勃朗特姐妹投递书信和邮寄她们著名的书稿的地方。”后面是店主人的家，腾几间闲房出租给游客。一张床，供一顿早餐，女主人亲自下厨，男主人打扫房间，这就是旅游地常见的所谓BB式（Bed and Breakfast）简易客店。从我的房间后窗望去，教堂的一角半隐在细雨中。每隔一刻钟，飘过来发闷的钟声。我顾不得休息，急忙跑下楼，开始了我访古的途程。

客店后门临一条弯曲陡峭的窄巷，盖斯凯尔夫人不无夸张地形容它陡得“像一堵墙”。顺着凹凸不平的方石路拐进去，绕过左边的教堂和右边的主日学校校址（头一间是教堂执事的居室，副牧师们的寄宿舍；夏洛蒂的丈夫亚瑟·尼科尔斯在这里度过了八年孤独凄凉的岁月，才终于赢得了他的新娘），两分钟后就到了勃朗特姐妹的家——牧师住宅博物馆。住宅正前方，隔着小小庭院和墙外的墓地，是教堂的后墙。一出教堂大门，斜刺里冒出一家酒店，那就是当年臭名昭著的“黑牛”酒店，她们那不成器的兄弟勃兰威尔经常在那里喝得烂醉如泥，被抬回家。仿佛撒旦向上帝挑战，故意将它安置在教堂门口，用它那诱人的琼浆来浇灌新洗净的灵魂。但上帝也不甘退让，他使教堂的墓地直逼酒店后窗。那灰白冰凉的石碑，隔窗睥睨着室内

景象，仿佛惨笑着发出无声的警告。不过，这个曾给勃朗特一家带来不幸的地方，如今却是一家愉快的饮食店。它保存着乡村酒店的情趣，五光十色，却又古色古香。就在这里，我品尝了咸味约克郡布丁的特殊风味。只有楼梯拐角处陈列着的一张勃兰威尔常坐的紫檀色木椅，把人带回到那悲惨的岁月。

同“黑牛”酒店一样，镇上所有的店铺如今都为旅游业服务，有许多冠以勃氏作品或人物的名称，如罗切斯特商店、谢莉商店、希思克利夫旅店、维莱特咖啡馆，出售与勃氏有关的饰物、纪念品或当地土特产，处处把人拉回到勃氏家族生活的年代。尽管如此，这个僻静的19世纪小山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国际旅游中心，每年接待游客二十多万，若不是因为交通不便，人数还会更多。房东太太骄傲地告诉我，这里是英国第二大文学圣地，仅次于莎士比亚故居。说它是“圣地”，并不过分。且看正街上每天那络绎不绝熙来攘往的人流，许多人不正是怀着香客的虔诚，前来瞻仰三位圣女的丰采和她们传奇式的家园？不过要看清圣像的真容，还得走进那座神龛——哈沃斯牧师住宅博物馆。

这座紧贴荒原的两层石屋，是勃氏一家四十年间的故居。1928年建成博物馆，又是勃朗特协会的常设会址。这协会和博物馆建立的经过，充分表现家乡人民对三位女作家的热爱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堪称佳话。当劫余的老父亲于1861年去世后，房产易主，勃家财物被拍卖一空。1893年，也就是夏洛蒂逝世近四十年后，在约克郡文化界名流倡议下成立了勃朗特协会，一个纯民间组织，目的在集资搜集勃氏文物，供后世缅怀和研究。协会成立之初，财务十分窘困。第一年末尾，共有成员一百七十人，资金二十九镑，眼看许多珍贵文物因无力购买流落海外。没有馆址，不得不在村中另一所小房子（现在的旅